

中传社会学书系（第二辑）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求职研究

朱
依
娜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传社会学书系(第二辑)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求职研究

朱
依
娜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求职研究/朱依娜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657-1563-1

I. ①社… II. ①朱… III. ①社会资本—影响—就业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6813 号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求职研究

SHEHUI ZIBEN SHIJIAOXIA DE QIUZHI YANJIU

著 者 朱依娜

责任编辑 黄松毅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563-1/D·156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导论 / 1

- 1.1 提出问题 / 1
- 1.2 文献回顾 / 3
- 1.3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目的 / 31
- 1.4 本书的基本结构 / 34

第 2 章 数据与方法 / 38

- 2.1 数据来源 / 38
- 2.2 分析方法 / 40
- 2.3 缺陷和不足 / 44

第 3 章 求职前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 / 48

- 3.1 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测量指标及描述性统计 / 48
- 3.2 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测量指标及描述性统计 / 58

第4章 求职中社会资本的动用 / 61

4.1 研究背景与分析视角 / 61

4.2 宏观就业制度的影响:动态的纵向比较 / 66

4.3 社区社会资本、组织类型和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静态的横向比较 / 74

4.4 本章小结 / 91

第5章 求职后社会资本的回报 / 98

5.1 使用社会资本渠道对就业结果的影响 / 98

5.2 使用不同的社会资本渠道对就业结果的影响 / 121

5.3 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对就业结果的影响 / 135

5.4 本章小结 / 146

第6章 总结与讨论 / 154

6.1 本书的主要发现 / 154

6.2 对主要发现的思考与讨论 / 159

6.3 未来的研究方向 / 165

参考文献 / 171

后 记 / 184

第1章

导论

1.1 提出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间,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乎完全处于相互隔离和漠视的状态: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就好像这类问题没有社会学特性;社会学家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试图将社会问题从经济力量中抽象出来,就好像这类问题没有经济学特性。以至于经济学的重心脱离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而专一地集中在经济利益问题上,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的重心脱离了社会的结构,社会学则只处理留给它的一隅之地,用强调社会结构的方法分析非经济的论题(斯威德伯格,2003:1-2)。

面对上述学科发展的困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社会学家,开始了对对方领域的扩展,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也开始增加。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方向有:贝

克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解释婚姻、生育和犯罪等社会学问题,代表了经济学向社会学领域的扩展(Becker, 1957, 1960, 1968, 1981);阿克诺夫和威廉姆森——偏爱在经济学中吸收一些传统社会学的见解,致力于在新旧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Akerlof, 1970; Williamson, 1975, 1981);科尔曼——试图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重构社会学理论,同时又摒弃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Coleman, 1986, 1999);格兰诺维特——用社会学视角分析传统的经济学问题,代表了社会学向经济学领域的进军(Granovetter, 1985, 1995)。

本书所要探讨的社会资本与求职问题,正是上述理论流派中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如格兰诺维特所言,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研究核心经济问题不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方向,也是其区别于“旧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标志(转引自斯威德博格,1999:6)。之所以采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是因为:

首先,社会资本视角质疑了主流经济学所建构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t)劳动力市场模型。由于传统经济学对行动者及其行为的原子化假设,导致经济学家忽视了职业匹配过程中社会关系的作用,因而大多数的经济学市场模型都是不完整的。例如用来检验匹配理论的雇员表现研究就忽略了职业场所的社会关系对雇员在职行为的影响(Castilla, 2002:5)。但事实上,匹配过程从来都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非个人化的市场环境中,而是源于“雇主用以招聘新雇员的雇佣网络和求职者用以寻求就业机会的供应网络”(Granovetter and Tilly, 1988:191)。因此,社会资本与求职研究就成为阐释市场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的一个范例。

其次,社会资本视角也丰富了社会学对“地位获得模型”的研究(Blau and Duncan,1967)。在社会学家看来,人们的求职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人的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但由于以往的研究只关注个人特征(如个人的先赋家庭因素和后赋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人们的社会网络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对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因此,这样的地位获得模型只解释了人们职业声望差异的其中一小部分。而林南及其同事的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研究则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个人生活机遇的这样一个特定过程:具有丰富社会关系的求职者比那些具有同等技能但没有相对社会关系优势的求职者更有可能占据地位高和影响大的职位,因为他们的关系人能够提供求职所需的影响和信息(Lin,Ensel and Vaughn,1981a)。

1.2 文献回顾

1.2.1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传统

本书的研究对象——求职,既属于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范畴,又属于社会学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范畴,因此,两个学科都基于各自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解释。下文分别从这两个学科的学科背景出发,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进行梳理。

1. 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和小麦或鞋子并无不同,因此可以将现货市场的分析逻辑推及劳动力市场,由此建构

一个单一静态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雇主是买者,雇员是卖者,工资就相当于劳动力价格;劳动者通过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选择他们的劳动力供应曲线,企业则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自己的需求曲线;供应和需求曲线的交汇处就是达到“市场出清”(market clear)的价格均衡点。^①

不可否认,这一理论视角非常有助于我们在微观层面理解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单一静态的模型无法解释例如失业这样的宏观经济现象,也无法解释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现实的挑战迫使经济学家开始建构更为真实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于是出现分割劳动力市场、工会行为分析、罢工经济学和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等劳动经济学的不同分支研究领域。

其中,与本书主题最为相关的是探讨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匹配(matching)问题的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这一理论最先被应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此后在这一领域所涌现的大量文献构成了劳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职业搜寻”理论(job search theory)。

作为对原有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一种补充,“搜寻理论”(job search theory)仍然遵循理性行动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和边际效用规律,所不同的是,该理论认为,由于面对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求职者无法获得所有可能关于就业机会的信息(例如,哪些行业的哪些公司提供了哪些工资水平的职位),因此他们必须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搜寻”。而对于求职者来说,最佳的搜寻策略是:通过比较“搜寻”成本和预期的边际回报大小来决定自己的搜寻行为,当求职成本等同于边际收益时,就接受现有职位,而停止搜寻(Granovetter, 1995:27, 29)。这是所有职业搜寻模型背后的基本逻辑

① 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的工资率是“市场出清”或“市场均衡”工资,它是自由运行的市场最终的通行工资率(伊兰伯格 & 史密斯, 1999:37)。

和分析起点。

最早的搜寻模型,是由斯蒂格勒(Stigler,1961,1962)所提出的“固定样本模型”(fixed sample - sized model)。在这一模型中,求职者的搜寻成本大致可以用要找的企业数量来衡量。每位求职者先决定要找多少家厂商,并在搜索完了这些厂商之后,再决定去哪一家工作。

后来,又有学者基于统计决策理论(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①提出逐次搜寻模型(sequential search model)(McCall,1965,1970)。这一模型假定求职者了解某一地区就业机会工资率的总体分布情况(当然,每个地理区域和每个职业或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布曲线),但不知道具体的哪些企业提供了何种水平的工资。求职者获得的每一个就业机会就相当于从这一分布中进行一次独立的抽取,在特定时间内获得一次就业机会的概率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因他搜寻的努力程度而异。因此,在早期的逐次搜寻模型中,求职者不再事先决定要找多少家企业,相反,求职者在每找到一家企业后,就需要决定是接受这一工作还是继续搜寻。这里指导求职者搜寻行为的就是决定何时接受某一工作而停止找工作的最佳停止法则(optimal stopping rule)。当就业机会的总体分布、求职者的收入和搜寻成本都具有长期稳定性,同时求职者又希望长期拥有所接受的职位时,最佳停止策略就是搜寻理论所提出的“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它的基本假定是:每个求职者事先都有一个保留工资,这一工资水平刚好使得继续搜寻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的边际收益。因此,在搜寻过程中,求职者一旦找到超过这一工资水平的职位就立即接受而不再继续寻找(Devine and Kie-

① 40年代,美国统计学家A.瓦尔德(A. Wald)创立了统计决策理论。他把统计推断看作一个决策问题,即从所有能够采取的行动方案之中选取一个方案,比如点估计问题就是从参数集合中选取一个参数值。任何方案都可能带来损失,决策原则是使损失越小越好。统计决策理论包括对于损失函数、风险函数、决策函数的分析。

fer, 1991: 5)。

上述两种搜寻模型,皆从求职者即劳动供给者的角度探讨职业搜寻行为,而没有考虑到雇主的招聘行为,因此是部分均衡模型(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而不是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基于此,代蒙德(Diamond, 1979, 1981)将劳动需求方引入模型,从而构建均衡搜寻模型(equilibrium search model)。在均衡搜寻模型中,一方面求职者(即劳动供给方)寻找空缺职位,另一方面雇主(即劳动需求方)也同时寻找雇员;职位和雇员的匹配过程是随机的,取决于求职者和雇主各自的搜寻行为。

除了将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同时纳入模型外,搜寻理论还将早期只分析失业者搜寻行为的模型扩展到“在职者模型”(search on the job),因为很多学者认为之前对搜寻者失业状态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有相当一部分求职者在变换工作前并没有经历失业阶段,而是在确保有另一份合适工作的情况下才放弃目前的工作(Mortensen, 1986: 869 - 870)。与此同时,“职业逛街”(job shopping)理论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搜寻理论的另一个不现实假定:一旦求职者获得一个就业机会,这一工作的所有特征信息就一目了然(Granovetter, 1995: 141)。

但经济学的职业搜寻模型仍然忽视了很多重要的现实因素。首先,这一模型本身从来没有得到检验,认为可以建构既简单有用的模型,又能够被劳动力市场数据拟合的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Devine and Kiefer, 1991: 8)。例如,保留工资事实上就几乎无法被观察到,即使收集到相关信息,它的预测能力也很低(Devine and Kiefer, 1991: 29)。其次,这一模型对经验研究的极大误导在于忽视了大量不是通过积极搜寻而获得的工作,也就是说搜寻理论只考虑那些主动和有意寻找的工作机会。而在像格兰诺维特这样的社会学家看来,那些无

意中获得的就业信息正是借助于求职者的社会网络,在基于其他目的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得到传播的(Granovetter,1995:142-146)。

2. 社会学对地位获得的研究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求职实际上是个人的职业流动和职业地位获得的一个过程,属于通常所说的“地位获得过程”(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的研究范畴。回顾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史,需要追溯到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1967)对地位获得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他们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一书中,运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详细分析了家庭背景(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地位)、个人教育和个人职业地位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即使考虑到“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父母地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教育和先前的职业地位)仍然是解释个体最后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林南,2005:76)。

由此,布劳和邓肯开创了社会流动的“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传统,地位获得模型也成为主导整个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范式(Breiger,1990:1)。到20世纪80年代,到处可见路径模型(path model)的实证研究(罗家德,2005:1)。但与此同时,批评和质疑也随之而来。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模型与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模型(human capital model)一样,只关注个人特征而忽视结构和制度因素,因而是一种“非结构性”(nonstructural)的研究模式(Breiger,1990:2)。而随后在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兴起的“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研究范式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主导范式的地位获得模型开始逐渐衰退,它的后继者“新结构主义”成为当时最具创新性的流派。该理论将个体雇员或阶级成员置于阶级(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1978; Kalleberg and Griffin, 1980)、权力 (Kluegel, 1978; Robinson and Kelley, 1979; Wolf and Fligstein, 1979)、组织 (Stolzenberg, 1978; Baron and Bielby, 1980) 和劳动力市场结构 (Stolzenberg, 1975; Bibb and Form, 1977; Beck et al, 1978) 等一系列更广泛不同背景下, 由此反对之前地位获得模型的同质性劳动力市场假设 (Althauser and Wallace, 1991: vii)。

本质上, “新结构主义”并没有完全脱离地位获得的研究传统, 而是在其基本分析框架下引入了影响最后地位获得的社会制度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索伦森 (Aage B. Sorenson) 认为地位获得研究和“新结构主义”的唯一重要区别在于, “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成了比较个人和结构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转引自 Breiger, 1990: 3)。很多结构主义学者 (Wright and Perrone, 1977; Beck et al, 1978; Kalleberg and Griffin, 1980) 坚持主张结构不仅比个人资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先于个人地位而存在的 (Baron and Bielby, 1980: 737)。

如果说“新结构主义”相对于之前的地位获得模型的突破之处, 在于试图证明具体制度、组织、精英团体、政治安排、市场体系、职业轨道和社会阶级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与“新结构主义”同时兴起的另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视角——的贡献则在于发现并解释了求职过程中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下面, 我们将首先介绍“社会资本”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然后回顾已有的研究是如何使用这一视角分析人们的求职过程与职业地位获得的。

1.2.2 社会资本理论

自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 (Portes, 1998:

3),经由后来学者的继承和发展,“社会资本”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解释力的跨学科的理论概念。尽管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进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该理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就像其他许多学术概念的发展历程一样,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也可以追溯到社会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并能在先驱人物的经典著作中找到它的影子。例如,马克思(Karl Max)关于原子化的自在阶级和被动员的、有效的自为阶级之间的区别,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对美国公民结社传统的高度赞赏,齐美尔(Georg Simmel)强调的“互惠交易”、规范和契约,以及被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视作解除原子化与自我破坏的良药的团体生活,都包含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元素。有些学者认为,甚至在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中也能找到它的理论踪迹(Portes,1998:2;Halpern,2005: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资本理论只是继承并发扬了这些学科先驱人物的真知灼见。

既然如此,社会资本理论如今又是凭借什么吸引了当代学者的注意力,并使得许多政策研究者们对其寄予厚望呢?笔者认为,它的创新和启发意义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一概念体现了众多社会学概念的核心内容(比如社会支持、社会整合、社会凝聚、规范和价值观);其次,作为资本的形式之一,它具有资本的共同特征,即关注回报和效用(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2001: vii),可以放在更大的资本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述,从而缩小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的距离;此外,如波茨(Alejandro Portes)认为的那样,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在于凸显社会交往的有利之处,可以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引向寻找成本更低的非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发展道路上(Portes, 1998: 2)。

下面将根据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对社会资本理论及其不同

的分析层次做简要的介绍。

1. 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1)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

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布迪厄等人开始。布迪厄是第一个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布迪厄一直致力于“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的研究,^①而“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源于其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兴趣,最初是作为一种与其他“资本”形式相联系的比喻方式出现,^②后来布迪厄才将这种比喻发展为有明确含义的理论概念和实际可用的资源和权力实体(Baron、Field and Schuller, 2000:3),并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为三种基本的“资本”形态(林南,2005:21)。布迪厄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这几种不同并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是它们之间如何互相转化从而达到积累的最大化(Baron、Field and Schuller,2000:4)。^③

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潜在或实际的资源总和,这些资源与持久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互相熟识或认可的关系网络——换言之,一个群体的身份——有关。”(转引自林南,2005:21)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两个因素:第一,作为个人资源渠道的社会关系;第二,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工具性的,强调团体参与

①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视为一种动态和创造性的,但同时又是被建构出来的现象。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有助于团体和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Baron、Field and Schuller,2000:3)。

② 这里的其他资本形式是指: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和学术资本(scholastic capital)。此时的社会资本还处于各种资本形式的边缘地位。

③ 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资源(例如资助贷款、投资倾斜和市场保护);通过与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接触,个人可以提高其自身的文化资本(例如具体化的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Portes,1998:4)。

为个人带来的利益以及个人以此为目的对社会交往的有意建构 (Portes, 1998: 3)。他认为, “由团体身份带来的利益是产生团结的基础”; 也就是说, 社会网络不是自然产物, 而必须通过投资策略而建立, 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团体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成为其他利益的可靠来源 (Portes, 1998: 3)。

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中, “经济资本”处于首要地位, “是所有资本类型的基础……每一种资本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可化约为经济资本” (Bourdieu, 1983 \ 1986: 252 - 253); 但其更为关注的是“文化资本”, 认为它是“社会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 理论的基础; 而作为前两种资本形式增值器的“社会资本”则位居第三。

虽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离不开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社会交往的不断投资, 但其仍具有自己独特的动力机制和生产过程。相对于经济交易, 社会资本交易具有更低的透明度和更高的不确定性 (例如, 没有明确的义务和确定的时间范围, 并可能违反互惠期望), 而正是“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有助于掩饰原本赤裸裸的市场交易 (Portes, 1998: 4)。

尽管在波茨看来, 布迪厄是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社会学家 (Portes, 1998: 3), 但他的研究还只是开创性的, 并没有提出完善的社会资本理论; 对“资本”概念的使用也经常处于一种隐喻的形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性的学术概念。^① 因此, 当布迪厄将其应用于经验研究时, 如何对这一概念进行操作化就成为一个难题, 由此也显示出这一理论的不成熟之处。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来

① 在《再生产》中, 布迪厄有时将“资本”概念视为对真实的货币、语言、文化知识和文凭等存量的追求, 有时又将其视为代表权力或社会特权的一般比喻, 因此复杂的理论诉求和贫乏的经验资料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自科尔曼的贡献。

(2)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论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源于其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种学科视角的共同兴趣,希望在结合这两种解释逻辑的基础上为社会学奠定新的理论基础——理性选择理论。^①“社会资本”概念就是其建构这一理论基础的工具之一。换言之,作为行动资源的社会资本是将社会结构因素引入理性行动范式的一种方式。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应该由它的功能来定义。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它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第二,为结构内部的行动者——不管个人还是法人——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88:98)。这里科尔曼一直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对于理性个人或理性行动的效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概念的价值在于通过社会结构某些方面的功能来识别和确认这些社会结构,从而为之前社会学家所熟知的结构因素带来新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他认为“像其他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得某些缺少这些社会资本就无法实现的目标成为可能。如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不是完全可替代的,而是针对于某些特定行为而言。因此,有利于一些行动的社会资本形式可能无助于或甚至有害于其他行动”(Coleman,1988:98)。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这种抽象和功能化的定义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评。譬如,波茨就认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是相当模糊的,

① 科尔曼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的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视角都存在严重缺陷:前者缺乏对个人动机的考虑;后者则建立在脱离现实的极端个人主义假设之上。因此,科尔曼希望一方面保留经济学的理性或目的行为假设,另一方面在摒弃其极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同时引入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从而为社会学建立更全面的理论基础。